

# 白居易在杭、苏时的“吏隐”心态及思想渊源

杜学霞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吏隐”是中唐士人重要的生存方式,包括“兼吏隐”和“隐于吏中”两种具体的心态。白居易出刺杭州、苏州时持“吏隐”心态,他的思想随着环境变化不断由“兼吏隐”向“隐于吏中”倾斜。白居易“吏隐”思想受到魏晋以来的“大隐”观的影响,也是中唐现实环境的产物。禅宗的世俗化,庶族地主的人生趣味,儒家济世情怀,中唐后期复杂的政治环境等均是白居易“吏隐”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吏隐;多重身份;禅宗;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09)04-0022-04

出任杭州和苏州刺史是白居易仕宦生涯的重要阶段,也是其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白居易基本上以吏隐心态对待这两次外任。“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是其在杭、苏时“吏隐”生活的写照,记载了他政治热情退潮的过程。

## 一、白居易“吏隐”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

“吏隐”<sup>[1]</sup>一词大约出现在盛唐,对中唐士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成为中唐士人较为心仪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字面上看,“吏隐”一词是矛盾的。“吏”是指做官;“隐”是指隐居,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将“吏”和“隐”合成“吏隐”,反映了中国传统士人出处行藏的角色性困惑。中唐士人以“吏隐”为进退,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文人的心理矛盾和他们为解决这种矛盾所做的努力。

在中唐,“吏隐”之“吏”有多重含义。它可以指官阶低微的小官,也可以指闲官或冷官,有时还特指外任官员(比如,在白居易诗歌里,像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和元稹任浙东观察使这样比较高的官职,也可以被称为“吏”,他们的外任生活也被称为“吏隐”)。就心态而言,“吏隐”大致可分为“隐于吏中”和“兼吏

隐”两种。前者从生存考虑,“吏”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收入,心理上仍偏重于“隐”;后者则将“吏”的职责与“隐”的自由看得同样重要,力求在当官时从心理上对名利采取超逸的态度,坚持“兼吏隐”的人仍不乏济世情怀。总是来讲,“吏隐”要兼顾“吏”的物质生活充裕和“隐”的自由两种好处。

白居易的“吏隐”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他任翰林学士时。此期间他在一首诗中说,“人间有闲地,何必隐丘林?……终当乞闲官,退与夫子游。”<sup>[2]286</sup>元和十年他被贬江州后,政治上处于低谷,白居易在《江州司马庭记》中写到:“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廩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仕禄之优稳者。……”<sup>[2]2732</sup>诗人虽是带着负气情绪标榜“吏隐”的,但我们仍能看出其“吏隐”思想的一个侧面。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发生的钱徽等人主持的科举考试舞弊案对白居易仕途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

收稿日期:2009-11-25

作者简介:杜学霞(1965-),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诗学研究。

响。围绕这个案件,朝廷里原本就有的矛盾激化了。作为复试官之一的白居易,处境非常尴尬。他在每一方都有亲故,要做到中立完全不可能。夹缝中生存的处境使他深感为难,朝廷的政治局势加速了他的选择:“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书论其事,天子不能用”<sup>[3]</sup>。于是,他产生了“终当求一郡,聚少渔樵资。合口便归山,不问人间事”<sup>[2]625</sup>的“吏隐”念头。长庆二年,白居易自求外任。由中书舍人改杭州刺史。三年任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未久,又被任命为苏州刺史,就任约一年,以病辞。总的加起来,他出刺杭、苏的时间不足五年。

## 二、白居易出刺杭、苏时的吏隐心态

白居易刺苏、杭时的“吏隐”思想包括“兼吏隐”和“隐于吏中”的两种心态。

下面这首诗,流露了他“兼吏隐”态度:

常爱西亭面北林,公私尘事不能侵。  
共闲作伴无如鹤,与老相宜只有琴。  
莫遣是非分作界,须教吏隐合为心。  
可怜此道人皆见,但要修行功用深。<sup>[2]1633</sup>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把“吏隐”当成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

白居易也以“隐于吏中”的心态来对待“吏隐”。如赴杭州路上,他声言:

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  
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sup>[2]1330</sup>

在出刺杭、苏大部分时间里,他在“兼吏隐”与“隐于吏中”之间摇摆,越到后来,则越向后者倾斜。

杭、苏均乃唐王朝上州,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地。身为典郡的重要官员,白居易深知自己肩负着重大责任。诗人对杭、苏有特殊感情,他青年时期曾避难于此,当时房孺复和韦应物分别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他倾慕二人的风雅,却苦于幼贱不得与之游,现在竟有机会在此领郡,于是韦应物“隐于郡斋”的“兼吏隐”就成为他仿效的目标。和韦应物“兼吏隐”而不忘济世一样,他也将两次外任看成施展自己政治抱负难得机会。杭州刺史任上,他曾满怀豪情地写到:

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  
此裘非缁亦非纁,裁以法度絮以仁。  
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覆一身。

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sup>[2]700</sup>

他曾为杭州的政务投入了很大精力,做了不少惠及百姓的事,如疏浚李泌六井就是他在杭州的千古善政。历史没有明确记载白居易在苏州的政绩,但从百姓对他夹道欢送的情景看,他的口碑相当好,刘禹锡在《白太守行》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溪。  
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当时总的政治经济形势却并不乐观。由于藩镇割据和统治者的奢侈无度,唐王朝在经济上早已捉襟见肘。朝廷经济全靠江南八道来支撑。杭、苏均是赋税主要来源地,沉重的赋税成为压在百姓身上的重要负担。白居易深感个人努力终究改变不了百姓的命运,故杭州任满,百姓欢送他时,他说惭愧地说:“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哪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sup>[2]1564</sup>

尽管勤于政务,“吏隐”始终是白居易刺杭、苏时的基本处世原则。既然“吏隐”要兼顾“吏”的物质富足和“隐”的个人自由,所以为政之余,保持诗意生活情调仍是白居易“吏隐”的主要目标。因此,几年时间里,他利用公务之便,游遍了杭、苏的著名山水:

苏杭自古称名郡,牧守当今为好官。  
两地江山踏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  
几时酒盏曾抛却?何处花枝不把看?  
白发满头归得也,诗情酒兴渐阑珊。<sup>[2]1675</sup>

为了表明对名利保持无所执著的超然态度,白居易不少诗歌描写了自己居官犹如隐居的郡斋生活。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个隐士,而不是典郡的要员:

松下轩廊竹下房,暖檐晴日满绳床。  
净名居士经三卷,荣启先生琴一张。……<sup>[2]1335</sup>

南方的城市经济远比北方发达,市井文化繁荣。受到南方城市文化的影响,他的“吏隐”生活明显地染上了世俗色彩:

宠辱寻过分,欢娱已较迟。  
肺伤虽怕酒,心健尚夸诗。  
夜舞吴娘袖,春歌蛮子词。  
犹堪三五岁,相伴醉花时。<sup>[2]1333</sup>

“吏隐”看似一种难得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既当官又隐居的“两栖”生活很难做到两全其美。中唐时,刺史作为外任官员,位崇事殷,兼有政治、军事、

经济等大权,每天有大量的公务需要处理。白居易刺苏州时,就经常陷入大量公务中,以致“朝也视簿书,暮亦视簿书,簿书视未竟,蟋蟀鸣座隅。”<sup>[2]1410</sup> 政务与个人情趣的冲突,“吏”的制度约束性与诗人喜好闲散的天性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于是,案牍劳神、公务烦心等情绪不时从笔端流露出来,有时将日常公务也看成负担:

闷发每吟诗引兴,兴来兼酌酒开颜。  
欲逢假日先招客,正对衙时亦望山。  
勾检簿书多鹵莽,提防官吏少机关。  
谁能头白劳心力,人道无才也是闲。<sup>[2]1391</sup>  
唯憎小吏樽前报,道去衙时水五筒。<sup>[2]1640</sup>

当“吏”与“隐”发生尖锐矛盾时,他的“兼吏隐”思想就明显向“隐于吏中”方向倾斜,弃官归隐的念头一次又一次冒出来,难怪他离苏州任时释然写到:

自此光阴为已有,从前日月属官家。  
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  
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sup>[2]1697</sup>

无论白居易怎样张扬“吏隐”生活方式,在实际生活中,“吏”和“隐”的平衡是很难维持的。作为身居要路的官员,其肩负的职责和他对个性自由的向往有着本质的冲突。“吏隐”,尤其是“兼吏隐”对于白居易而言,最多不过只是一种生活理想而已。

### 三、白居易“吏隐”思想的根源

白居易的“吏隐”思想来源复杂。

首先,白居易的“吏隐”思想受到魏晋以来的“大隐”观的影响。

魏晋以来,士人的隐逸观已经由肥遁山林的“小隐”转变为“隐于朝市”的“大隐”,如王康琚在《反招隐》诗中就提出“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观点<sup>[5]</sup>,盛赞“大隐”反对“小隐”,认为“小隐”是“矫性失至理”。魏晋的“大隐”观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重形迹而追求内心超越,这种心灵化的隐逸观魏晋以后受到士人的普遍推崇。白居易从一开始奉行的就是“大隐隐朝市”的思想,明确提出“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的“大隐”主张。<sup>[2]1140</sup> 他的“吏隐”与“大隐”相似之处在于参与都政治体制运作,物质生活上与“小隐”相对比较有保障。他的“吏隐”与“大隐”的不同在于,“大隐”与政治中心——朝廷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吏隐”虽然也是做官,做的是外任官或闲官,与政治中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第二,禅宗对白居易的“吏隐”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对于佛教其他宗派的打坐、吃斋、供养等修行方式,禅宗突出了个人体验的重要性。它奉行的是“无住”和“无念”,讲究的是“即心即佛”。所谓一念迷,即凡夫;一念悟,即佛陀。在此思想影响下,禅宗倾向于认为,真正的修行没必要放弃世俗生活,而是应该生活于红尘又不执著于红尘。禅宗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士大夫们的口味,使他们的身份多重性得到了有效的整合。身份多重性是中国士人的主要特征。文人和政府官员是中国士人的两种主要身份,但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文人喜欢自由的天性与官吏须有一定的职责意识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由于禅宗认为出世和入世都只是心理问题,关键在于一个人的心理是否超脱,基于这点,中唐士人不仅将“吏隐”看成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还将“吏隐”看成是真正得道的标志。

禅宗是白居易“吏隐”思想的主要理论依据。他早年起就接受了禅宗的影响,将隐逸看成心理问题而不是时间和地点问题。任校书郎时,他说“真隐岂长远,至道在冥搜。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sup>[2]273</sup> 任左赞善大夫时,他表明“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sup>[2]353</sup>;在江州时他也说,“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饥。我既心无苦,饮水亦可肥。”<sup>[2]405</sup>;“偶得幽闲境,遂忘尘俗心。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sup>[2]445</sup> 由此可见,他从入仕时起,对隐逸的理解就与禅宗的思想是一致的。

第三,白居易的“吏隐”也与他物质生活的实际态度有直接关系。他在诗歌里经常流露出对物质生活的关心:

“欲作云泉计,须营伏腊资。”<sup>[2]1007</sup>

非无解挂簪纓意,未有支持伏腊资。<sup>[2]1226</sup>

他这种态度在中唐有代表性。例如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就说过,“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sup>[4]</sup> 相对于盛唐人的理想和浪漫,中唐士人大多是理性和务实的。他们对物质生活的实际态度,也反映了士人生存境遇的变化。中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庶族地主(寒士)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没有豪门世族的文化优势和财力,也意味着他们不拥有与君主抗衡的能力,意味着他们对君权的依赖性远远地大于世族。像白居易这样出身寒门的士人,国家俸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惟一生活来源,他们必须通过为君主服务来

取得自己生活资本。如果隐居山林,那就意味着失去生活来源。即使他们自己可以做到“饮水亦可肥”,但对家庭的责任感也使他们无法放弃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

第四,庶族地主的人生趣味决定了白居易必然以“吏隐”为进退。白居易在他的诗歌《雪中早起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中曾经坦言“上无皋陶伯益廊庙材,的不能匡君辅国活生民。下无巢父许由箕颖操,又不能食薇饮水自苦辛。……红尘热闹白云冷,好于冷热中间安置身。”既然无法忍受隐居山林的寂寞,也受不了隐居山林的艰苦,只好折中妥协,走“吏隐”的道路。如果我们将白居易与陶渊明比较,就可以看出二人处世态度的明显差别。白居易仰慕陶渊明,还创作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但对世俗生活的留恋,重视物质享受,使他终究不能认同陶渊明的贫困甚至乞食的生活方式,只好选择“吏隐”这种较有保障的生活方式作为归宿。

第五,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烈的入世情怀使白居易难以放弃济世理想。

白居易的思想并不是一下就由兼济转向独善的,其政治热情有一个逐渐退潮的过程。由于“兼吏隐”仍然包含着对社会的责任,所以“吏隐”仍可被看做一种济世的迂回性策略。

最后,中唐政治环境是白居易“吏隐”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元和中兴曾经鼓舞了士人对朝廷的信心。但是短暂中兴随着唐宪宗薨逝化为泡影。长庆以后,藩镇割据势力重新抬头,朝廷里阉寺专权,党争激烈,权利更迭频繁,这一时期的官员大多经历过贬谪或外任的。为了度过贬谪或外任的岁月,在人生失意时保持一份平和心态,他们往往以“吏隐”为解脱法门。如果说白居易在长庆初年就走上了“吏隐”道路的话,到了后来,“吏隐”则几乎成了中晚唐士人的共识。

#### 参考文献:

- [1]蒋寅. 古典诗歌中的吏隐[J]. 苏州大学学报, 2004(2):51-58.
- [2]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3]刘昉. 旧唐书:第166卷;白居易传[M]. 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9:2955-2967.
- [4]刘禹锡. 刘禹锡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479.
- [5]王康据. 反招隐[M]//萧统.文选:集部:第22卷. 李善,注.胡克家本.北京:中华书局, 1977:310-311.

## Bai Juyi's Living Style of Official Seclusion in Hangzhou and Suzhou and His Ideologica Origin

DU Xue-xia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enzhou Normal College, Zhenzhou 450000, Henan, China)

**Abstract:** Official seclusion was an important living style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It included two kinds of mentality: Jian-li-yin and Yin-yu-li-zhong. Bai Juyi insisted official seclusion living style when he was an official in Hangzhou and Suzhou. His thinking changed gradually from Jian-li-yin to Yin-yu-li-zhong with the changing of living surroundings. Bai Juyi's official seclusion was effected by Da-yin thinking from Wei-Jin dynasty. It was also formed by the middle Tang dynasty's social situations: the customizing Zen, the flavor of popular intellectuals, Confucianism, the complex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so on all we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ich Bai Juyi's official seclusion.

**Key words:** official seclusio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several identities; Zen; customizing

(责任编辑:吴有定)